

中国革命史 专题讲稿

第四册

江西省 现代史学会
中共党史学会

目 录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引言	戴向青	(1)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张传贤	(16)
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张传贤	(30)
国民经济的恢复	张传贤	(51)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孙剑纯	(68)
反对高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 权力的斗争	孙剑纯	(129)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李元勋	(15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陈学明	(187)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述评	焦秀端	(206)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	焦秀端	(24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	孙剑纯	(270)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吴云俊	(310)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 和贯彻执行	吴云俊	(350)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教育	吴耀奎	(389)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党在思想文化工 作中的成就和错误	孙剑纯	(415)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

引 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今它已走过了三十六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六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所取得的政权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尖锐复杂斗争的三十六年，是我们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重大变化的三十六年，是各族人民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和光辉胜利的三十六年。

一、建国后党史的特点

(一) 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建以来，经过二十八年流血牺牲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赶跑了美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除台湾以外的全国范围的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伟大成果，是中国人民的长期宿愿，是历史的必然。

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党的主张究竟是否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在执政以后才能切实体现出来。在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党的工作，无论正确与否，都不能不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全体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全面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世界政治和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也不能不发生比执政以前更大的影响。经过三十六年来的历史实践，我们党的理论、主张、组织和领导受到了反复检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党执政以来的各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从而，使马列主义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前进了一大步。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这个决议，必然会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犯或少犯错误。

执政党，必然有些共产党员要去当“官”，如何看待这个“官”，如何履行“官”的责任、义务，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把“书记”、“厅长”、“处长”、“经理”、“主任”等职务，看成是高人一等“官”，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立于群众之上，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成为作威作福的“老爷”。这样的“官”，必然脱离群众，必然犯错误，甚至被人民被历史所淘汰。反之，同群众心连心，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和群众同甘共苦，这样的“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总之，执政党的共产党员必须解决是当“官”，还是给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根本问题。

执政党，在各条战线上，大都是共产党员掌权，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然而，如何用“权”，却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大部分共产党员运用手中的权利，千方百计给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衷心爱戴，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有少数共产党员，利用党和人民给的权，无空不入的以权谋私，甚至以权拉帮结派，为非作歹，成了法不能容的犯罪分子。运用手中的权利，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奋不顾身的为人民服务，应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

(二) 执政党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我们党执政后，很快恢复了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没收了

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接着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上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大国，完成了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执政党必须狠抓经济建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执政党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抓发展生产力、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是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任务。舍此，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走到邪路上去。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在战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破坏之后，列宁提出如何理解政治的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只要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还强调说：“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都是要领导实际的国家建设。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70—371页）

我们党的八大，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及时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抓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正确路线没能坚持下去。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连续不断的逐渐升级的大抓阶级斗争，强调政治就是各阶级间的斗争。长期把经济建设丢到一边，无人敢过问，致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而不能大发展。民穷国弱，就是不抓经济建设，而大

抓阶级斗争的恶果。这是我们这个执政党在八大以后一条十分严重的教训。

(四) 执政党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既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执政党必然会遇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工作工资问题、水旱灾荒问题、住房道路问题、教育和医病问题等等，都要找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这个矛盾是大量的复杂的，其中也不可避免的会有少量的敌我矛盾，必须严肃对待和处理，但更主要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坏，涉及到党的威望能不能巩固发展，涉及到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发展的大问题，处理得好，就会出现民富国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反之，则会出现国家穷困、民不聊生，甚至出现骚乱的情况。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方法处理。我们党执政三十六年来，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

上述几个特点，仅是自己学习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体会，不当之处，一定会有，欢迎批评指正。

二、建国后党领导的主要成就

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应当是我们研究和宣传三十六年党史，国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偏离这个指导思想就不可能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三十六年来的党史和国史。

建国后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国内外敌人相勾结虎视眈眈妄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英勇奋战，进行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彻底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全面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任务。与此同时恢复和发展了残遭破坏的国民经济，胜利地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在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三年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我们党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顺利地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史无前例的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旧中国由于旧军阀、新军阀连年混战和反动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经济十分落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异常缓慢。建国后中国人民在破烂不堪的战争废墟上建设祖国和家园。在党的领导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引下，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干扰破坏，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日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进。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原

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收回，牛胰岛素的全人工合成，“银河”巨型亿次计算机通过鉴定，试验通信卫星的研制、发射和定点成功，集中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伟大成就。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国防事业得到逐步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国防工业，不仅能够生产飞机、坦克、火炮、战术导弹、舰艇等常规武器，而且掌握了国防尖端技术，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战略武器，不仅可以生产我军自用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还向世界许多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军事装备和军工成套项目的援助。不仅中国人民任帝国主义欺凌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成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翻身求解放的鲜艳旗帜。

三十六年来不仅工农业生产大幅度的增长，交通、邮电、文教、卫生、体育等事业也都取得了空前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新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

三十六年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了提高，不仅完满解决了帝国主义曾预言我们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而且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日益富裕和幸福，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以及提倡多种经营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城乡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批又一批的劳动者成了小康之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舞他们满怀信心，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三十六年来，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正如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昂首挺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强大力量。

三、用一分为二观点研究建国后党史

作为党史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者，只看到三十六年的伟大成就及其经验还不够，还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到事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缺点错误及应吸取的教训。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因此，只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历史事件才能全面的客观的反映历史，才能正确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用以指导现实。

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大张旗鼓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总的说是对的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因为《武训传》所宣扬的人和事都是不值得宣扬也不应该宣扬的。然而也有过份的地方。江青参加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对武训历史进行调查，是采取先划框框定调子后找材料的办法，对合口味的材料全部吸收并尽力夸大，对不合口味的材料一概弃之不用。因此，江青参加起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把一个一生无田无地，无家无室的武训，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予以批判。对《武训传》的编导者赞颂者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给予诚挚的批评帮助，而是采取一哄而起，不许辩理，围而攻之方法严加批判，甚至给纪律处分，使文化界文艺界人士从此心有余悸。

接着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都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都有不当之处，尤其是把学术上的分歧和某些观点错误，极不慎重的定为“反革命集团”，打击了一批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有某些缺点的知识分子。这种“左”倾错误作法，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各界人士及广大党员响应党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有益的批评建议，这都是正常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对某些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言论进行批评，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予以回击，借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党中央的领导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份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视为右派进攻。反击右派后，把一大批人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我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长期受委屈，受压制，而不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失，这里有沉痛的教训需要加以认真总结和吸取。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对这段历史如何分析和评价？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客观地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

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应当说决议这段话对所谓“三面红旗”作了科学总结。但我们如何理解，在现实中如何吸取教训，还需要很好的学习和研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并作了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毫无道理，完全错误的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一批人被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的继续。”并强调这种斗争要斗半个世纪。这个批示使这场错误斗争的性质更加升级。从此，把党内的矛盾更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批判和处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外都日益严重。总之，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斗争影响是很坏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发展的更严重，这里有沉痛的教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理论，把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此，开始形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导下，“左”倾错误日益严重化。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城镇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尤其错误的是一九六五年初又提出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的理论开始出现。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理论根据。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危害、后果，都需要深入研究，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光荣传统必须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必须肃清，“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三种人”必须清查出来，“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深入研究、认真的、全面的总结和吸取其经验教训。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实际上是造反起家的华国锋怎么会成为党的领袖接班人？“两个凡是”观点的危害及其错误性质是什么？这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四、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和意义

从上述两部分论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我们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三十六年的奋斗中，有令人振奋的胜利进军，也有使人悲伤的严重挫折，但我们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这些经验予以总结，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用以教育子孙后代，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我们党领导全国

人民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在战乱的废墟上，在土豪劣绅、土匪恶霸干扰破坏下，能够迅速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人民掌握政权后，能及时稳妥的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看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打退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和进攻，如何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打败了装备优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显现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强大生命力。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后，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抓经济建设，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的需要。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执政党必须抓紧抓好的根本大事。舍此，另搞一套，就会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正确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分析和估量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总结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沉痛教训，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重犯相类似的错误，以更好的稳步的扎实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斗争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我们党内为什么会产生林彪、康生、“四人帮”一类野心家、阴谋家，并懂得如何识别他们、战胜他们，使他们不钻进领导班子，尤其不能让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研究建国后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这个区分是异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人鄙视厌恶林彪、“四人帮”鼓噪一时的假社会主义，向往人民富裕幸福的真正的社会主

义，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

研究建国后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在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应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处理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使人们既知道拥护领袖的重要性，又认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从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基础上加强党的建设。

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处理同各个国家兄弟党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党有丰富的经验，同样也有必须总结和吸取的严重教训。

总之，只有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才能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才能总结出我们党执政后运用这些规律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的使党史研究为十二大制定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才能更好的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服务。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是人所共知的，没有什么可研究的，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是缺乏科学头脑的表现。

五、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在长期个人崇拜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把党的光荣斗争历史搞的混乱不堪。是非颠倒，人妖难分，在政治思想领域造成极端混乱。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史研究，并从上至下建立了党史研究机构，在党史领域有力地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捏造和歪曲历史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影射史学，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混入党内的林彪“四人帮”一类

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篡改历史，把自己打扮成“老革命”“历史功臣”以抬高自己身价，妄图以此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篡改历史，是他们的一种惯用的重要手法。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通过写书、写文章、画画、演戏、展览等形式为所欲为的践踏历史。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都想从历史的百花园中捞取美化自己的花朵。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通过揭发批判，暴露了那些党的败类的丑恶嘴脸，并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界拨乱反正的重大成就。

批判了突出个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弄清了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强调了集体智慧和力量，恢复了唯物史观。自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个人崇拜，神化领袖逐步升级，从“捷径论”、“顶峰论”、“中国几千年一个”、“世界几百年一个”，到“最最最”“您您您”的致敬电，加上早敬、餐敬、晚敬，忠字室、语录操等迷信活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上可谓达到了“顶峰”，这无疑是把拥护与热爱领导庸俗化了。这种个人迷信活动的煽动者不是别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实际他们损害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破除了个人迷信，停止了各种迷信活动，正确地宣传了领袖的作用，使广大群众更加热爱领袖同领袖心连心。这就是党史界的又一重大贡献。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恢复了一批党的领导人的名誉，实际上也是恢复了党的光辉形象。我们党一产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一般说都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当时杰出的有威望的革命活动家，后来有些人犯了错误，甚至变坏了，那也是难免的。不能因为个人的变化

而否定除毛泽东同志以外的一切领袖人物。“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权的野心，煽动造反派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栽赃诬陷，不择手段编织材料、罗列罪状，一律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大讲特讲所谓“三个叛徒集团”。如果党的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都是坏的，怎么会有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呢？因此，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对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和污蔑，严重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史界以确凿的史料，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了各个时期党的领袖人物，澄清了是非曲直，恢复了党的光辉形象，这是党史界又一突出成绩。

一九五七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左”倾运动，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大批党的骨干打成什么“反党分子”“三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政党，攻击污蔑的一无是处。党的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下，各级领导和党史工作者，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打破了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理有据、敢想敢为，为数以万计的老干部、老党员、老专家平反昭雪，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党史研究中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犯有错误的领导人，不能在任何书籍、文章和展览中出现，否则都是为什么“分子”树碑立传，就是分庭抗礼，就是反党。因此，对林彪、“四人帮”不喜欢的领导人，只能省略，原始文件有名者也要用香火烧掉，名曰“作技术处理”。这样党的创始人没有陈独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没有张国焘、八路军没有总司令，志愿军没有司令员。这种延续多年的奇怪现象，在

党的三中全会后，终于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勾销、省略、烧掉的作风。不仅不再认为正当，反而会受到指责。这就是党史研究领域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这是党史界认真贯彻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重大是非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在国内外都引起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直接指导、全党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影响中外的伟大成果，这其中无疑有党史工作者一份不可少的贡献。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敢于打破左的条条框框，冲破了一块又一块的禁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出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及其说明，各省市各地区的党史工作者在搜集整理资料和编写地方史、根据地史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党史的研究工作已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我们党史工作者要以建国前后两个决议为指导，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促进党史研究新局面的发展而努力奋斗。